



入讀四年 激勵一生

——記在校時的良師益友

輝社 趙善能

我由一個渾噩的無知少年，逐步成長為對祖國建設有點貢獻和對香港社會有點承擔的土木工程師，應歸功於入讀母校中華中學四年所受到的培育與薰陶，給我打好了堅實的基礎，激勵我一生，鞭策和錘煉我勇於走向生活，敢於走向未來。

母校有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當年位處半山區，校園寬敞，有一座校舍大樓，有一個大操場，有兩個籃球場，有「非洲森林」之稱的一大片綠化地帶，這些優越條件，可以足供十班課室和各科特別室之用，可以每星期一舉行全體師生參加的週會，可以舉辦各項球類比賽，進行體育鍛鍊，舉辦除夕野火會。附近還有龍虎山，方便舉行一年一度的爬山比賽。



▲ 2016年3月拜訪岑老師時攝

我入學時，家住西營盤，每天返學都沿著很陡斜的東邊街直上，經過般咸道，轉入屋蘭士里，路過舊日的西南中學，由崎嶇的山路踏著石級到達學校，四年如一日，既鍛鍊了身體，又培養了堅毅的意志。我感謝母校首先給了我後來為祖國服務的「本錢」。

母校有一個優秀的教師團隊。眾所周知，1926年建校以來，有名書法家、學者和許多孜孜不倦和教導有方的老師來校任教，培育了大量人才。在我們入學年代，教我們輝社的，如教歷史的黃迺秋老師，教化學的黃潛老師，教數學的袁遠老師等等，都是其中之表表者。這裡，我想著重談談我對下列三位老師的深刻感受。

啟蒙導師 鍾廷明老師

他是我們輝社初中二和初中三年級的班主任，又是國文科老師。他思想進步，為人正直，對學生循循善誘。在那火紅年代，面臨全國解放，他耐心教導我們緊跟時代脈搏，關心祖國政局和香港社會實況。輝社部分同學在他



▲ 1948年鍾廷明老師(第二排右一)與輝社同學到青山禪院郊遊

的啟發下成立了「奔流」學習小組，學習時事和閱讀進步書刊，學習社會發展史，激發同學們的愛國熱情，認識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堅信國內解放戰爭一定會取得全面勝利。鍾老師在 1948 年就曾組織部分同學在一位同學家中，聆聽作家谷柳介紹他的著作《蝦球傳》包括《春風秋雨》、《白雲珠海》和《山長水遠》三部分；在另一場合，聆聽郭沫若談他的歷史劇《屈原》；又曾在一個大課室裡，聆聽茅盾談有關文藝創作問題。通過這些座談會的實際活動，去引導我們認識祖國和關心社會。

他介紹我閱讀《聞一多的道路》和艾思奇的《大眾哲學》。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的兩本啟蒙書籍，後來在校刊《昆侖》上發表了我寫的讀後感：《聞一多的道路，就是我們的道路》，以表心跡。



▲ 1949年底岑桑老師(前排左一)與輝社部分同學郊遊

鍾老師教我們國文課，在我們的作文卷內多有所批示，除在語法修辭方面給予糾正外，還糾正我們的錯誤看法，指出光明正路。例如，他在我的一篇作文卷裡寫上一句鼓勵評語：「朋友，努力吧！你是有前途的。」我看了深受感動。在他離港前夕，



臨別贈言，在我的紀念冊上寫著：「保持和發揮你底勤謹細心的學習工作態度，加上勇敢堅決的戰鬥精神，使你的整个人生更加完美。」這些金句，後來都成為我的座右銘，一直鞭策我面對戰鬥的人生。鍾老師在我們初中畢業時就離校，返回內地，投身於祖國的文化建設工作。

國學導師 岑桑老師

岑老師是我們高中一乙班的班主任，又是國文和歷史兩科的老師。當年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他是一位年青小伙子，意氣風發，和藹可親，對中國文學造詣很深。

他剛從廣州中山大學畢業即來港教書，年齡跟我們差不多，富有青春氣息，和我們這一群學生打成一片，一起去旅遊，熱情指導和參



▲ 祖芬校長一直是校友們尊敬的導師。

與班內的各項活動，和我們暢談國內解放戰爭的大好形勢。1949年10月，在班聯會舉辦的慶祝新中國成立的聯歡晚會上，輝社準備演出舞蹈《魔王末日》，由於人手不足，岑老師主動找我這個從未學過舞蹈的門外漢加入排練，鼓勵我大膽嘗試，終於成功演出，從此令我對陶冶心靈的文娛活動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上國文科時，向我們講語法修辭，上歷史科時，向我們講歷史故事，生動活潑，娓娓動聽。他教導我們，一定要堅持每天寫日記，並指出它有三大好處：一、可以幫助我們提高寫作水平，令文筆流暢；二、可以訓練恆心；三、可以對自己每一天的學習和工作做出檢討和改進。對此，我開始寫了日記的第一頁，並一直堅持下去，深深體會其至理名言。他介紹我們閱讀俄國著名作家L.托爾斯泰的古典名著《安娜·卡列尼娜》，認為它文筆秀麗，描寫細膩，有獨特風格。我聽從他的忠告，從閱讀中獲益良多。

岑老師和我們相處短短半年，就返回內地參加文化建設工作，成了著名作家，在我國文化領域中建樹卓著，成果豐碩。今年屆90，寶刀未老，仍未言休，繼續為祖國文化建設事業作出巨大貢獻。

終身導師 黃祖芬老師

芬先生貫徹並發揚黃冷觀老校長倡導的「作育青年，復興民族」的創校



▲ 2012年輝社校友到赤柱郊遊(左五為鄧世南校友)

宗旨，進一步演繹為對學生進行「人格陶冶」和「體格鍛鍊」的嚴格要求，堅持愛國教育的優良傳統，提倡「中華」精神，在實施德、智、體、群、美五育方面，建樹良多。

他熱愛自己的愛國教育工作，畢生對教育事業作出無私的奉獻，無論在中華中學、育華中學，還是在育華專科夜校，都親力親為，不辭勞苦，樂在其中。芬先生教學嚴謹，對學生要求嚴格又嚴厲，諄諄教誨我們要做好功課，學好本領，才能為祖國效力。當初我們對此曾一度有所誤解，以為用功課來壓制我們，令我們不能參加校內外的各項集會和社會活動。經過幾十年的實踐證明，芬先生當年站在校長的立場，其見解和做法是正確的，用心良苦。

在校時，芬先生教導我最深刻、永誌不忘的，有兩件事：

1949年9月，在開學典禮集會上，芬先生頒發給我的「學期成績優異獎」時，竟然是俄國列寧的名著《左派幼稚病》一書，我接受後心跳的很急速，它擊中了我的要害。以後長期對此銘記在心，時刻警惕自己千萬不要犯左派幼稚病。

1951年10月，芬先生教我們英語科，講課生動活潑，要求我們多看英文書，多做英文寫作。我的英文作文比較差，以致「英語」小考成績不及格，芬先生在課堂上語重心長地對我說：「趙善能，你走向下坡了！」這當頭一棒，我臉紅了，暗自下決心一定要學好功課。



芬先生一生品格高尚，潔白特，兩袖清風，生活樸素，為學校設立助學金，關心和幫助家境困難的老師和學生，而他本人卻從不置私產，甘於住「陋屋」。記起八十年代芬先生和芬師母借住於中資機構在中環永和街的宿舍，我們曾前往拜訪，原來那是待拆卸的舊唐樓，木樓梯，居室內四處都是加固的木柱，仿如森林；後來搬到土瓜灣的中資機構宿舍，同樣是十分簡陋，芬先生卻毫無怨言，如常生活和工作，自得其樂。

芬先生雖身為全國政協委員，但沒有架子，平易可親，熱心助人。我們返回香港工作後，他關心我們的處境，對我們在工作上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歧視，深表同情，積極代向有關當局反映，爭取香港承認內地工程師的專業資格；他熱情為多位同學寫曾經入讀母校的證明，以便補領香港身分證，成功取得永久居留權；他關心學生在內地的工作現況，想辦法給予協助；由於與裱畫單位稔熟，他親自代我送取裱裝有黃苗子題詞的一幅畫；他對我俯愛有加，曾送贈一本《一九七一年港澳各屆代表赴京慶祝國慶圖片選輯》，其圖片說明，是由蘇述美先生用鋼筆繕寫，用油墨印刷的，現仍在我的珍藏中。更加令人感動的，他將育才文化有限公司補償給學校的全部資金，用作購買蘭杜街兩個單位住房後，無償地送給校友會。芬先生一生的高風亮節，不愧被目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完人，永遠是我們在人生戰鬥的旅途上的楷模。

湧現愛國進步群體

學校有一批團結互助，共同進步的學習群體。當年身處即將全國解放前夕的火紅年代，香港愛國學生運動風起雲湧，母校亦群起響應，由一些思想進步的老師如鍾廷明、岑桑等啟蒙和推動下，各班紛紛組織起來。除有全



▲ 1992年鄭偉榮校友(前排右二)與輝社校友相聚。(後排左三是黎保裕校友)

校性的學生會及後期的班聯會外，各班還成立了各式各樣的學習小組如「鐵流」、「新苗」、「長風」等，我們輝社亦成立了「奔流」學習小組，學習時事和進步書報雜誌，在課餘參加社會上各項愛國活動，熱情參加各進步學校聯合舉行的慶祝新中國成立的聯歡晚會，油印出版班內刊物《前哨》，登載同學們歌頌新中國的詩文和感想，從而形成一個學習和戰鬥的集體。到了高中二年級，為響應參加建設新中國的號召，作好迎接返內地升大學的準備，班內成立了社會科學學習小組，除組織組員學習進步書報，深入認識個人前途必須和祖國前途相結合，培養愛國情操外，還建立各學科的學習小組，共同溫習功課；並深入了解各同學升學前遇到的具體困難，盡量協助解決。結果組織了班內 18 位同學（全班 29 人）返內地入讀大學。

鄧世南：醫德醫術的楷模

鄧世南和黎保裕都是在 1946 年復校時入讀初中一年級，直到高中畢業，在校長達六年。鄧世南學兄曾擔任我班班長、全校班聯會副主席，對國內外形勢發展特別關心，記憶力特強，對報章雜誌發表的有關新聞和文章，經常給我們詳細介紹，如數家珍，引起我讀報和閱覽課外讀物的濃厚興趣，是我的啟蒙老大哥；他對同學謙虛熱情，大家都喜歡和他交往；他又是班內文體活動的積極分子，帶動班內同學一起參加各項有益的文體活動和社會活動，是班游泳隊和班籃球隊的成員。在我參加編寫的《中華中學、育華中學年表》中，他為我們提供了不少寶貴的參考資料。



▲ 2005年黎保裕校友（右三）約同陳伯民老師（左二）、蔡一山老師（右二）及部分校友探望年邁的梁治球老師（右四）



世南校友在 1952 年高中畢業後與我們一起返內地升讀大學，入讀華南醫學院（後正名為中山醫科大學），五年本科畢業後被分配到該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耳鼻喉科工作，歷任專科醫生、主治醫生、科主任、副教授和碩士研究生導師等職務（醫院耳鼻喉科在他退休後升格為耳鼻喉專科醫院，如未退休，他會屬院長級）。他除主管日常專科門診外，還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進行科學研究，在 1979 年至 1995 年期間，和同事一起發表了十多篇包括鼻咽癌治療和有關手術等醫學論文，登載於《新醫學》、《中山大學學報（醫學科學版）》、《廣東醫學》等雜誌上，為國家作出貢獻。

他為人低調：沉著踏實，不愛炫耀自己，他在醫院擔任的具體職務，從不向我們披露。他作風正派，醫德和醫術並重，從不收取病人送來的紅包和禮物。他說，病人早日康復出院就是給他的最好酬報。這種高尚品德是難能可貴的，所以深受病人和家屬愛戴。有次一位病人暗中隨他回家，打聽好他的住處以便送禮到家，他發現了，故意兜兜轉轉行了幾條街避開，有人開玩笑對他說：「抵你窮啦！」。他繁忙地為病人做手術，經常廢寢忘食，過度辛勞，終於病倒，卻仍不下火綫，延誤就醫，結果 1985 年開始先後切除胃和右半結腸各大部分，膽囊和腎上腺的全部，但他仍繼續樂觀地生活，堅持如常熱誠地工作，直到退休。他還幽默地對我們說，他是「四大皆空」。

世南樂於助人：我在大學階段，星期日有空，從石牌的工學院出廣州市區，會到百子路的醫學院和他相聚，互訴近況，虛心聽取他的意見，獲益良多。他有甘於「安貧」的高尚情操：這裡的「貧」，泛指簡單樸素的生活。他長期居住在有幾十年樓齡的醫院宿舍，直至今年離世。沒有電梯，樓梯破舊，要行上五層樓；室內佈置簡樸，但樂也融融。1963 年左右，他到北京參加中華醫學會耳鼻喉專科年會，暫住我家數天，卻不嫌棄我們僅有 12 平方米的建築工程部宿舍居室，和我共枕談心。他仗義勇為：1970 年初，我父親返廣州和我們一家團聚，突患中風，半身癱瘓，醫院無病床收容，決定回港就醫，我們束手無策。當時仍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大家都不敢和海外關係沾邊，怕受影響挨鬥。我有一位親戚在醫院人事部門工作，更銷聲匿跡。後來還是鄧老哥見義忘私，主動為我們安排救護車將家父送到深圳，由我的堂兄和朋友抬過羅湖橋。此情此景，令我們全家感動萬分，永遠難忘。

鄧老哥一直對芬先生和校友會都十分關心：一年一度的校友會聯歡聚餐晚會，一定從廣州前來參加，特為此住一晚旅社，熱情和輝社學友共敘，年年如是。他手術後健康較差，仍如常來港參加。這種對待疾病的堅強意志，一直維持到他離世，殊屬令人欽佩。

黎保裕：「中華精神」的承傳者

黎保裕學兄與我同窗四年，一起參加班內「奔流」和「社科」學習小組，一起排練和演出舞蹈《魔王末日》，一起去灣仔國泰戲院看前蘇聯進步電影，互相鼓勵，共同進步。他還以筆名「衣谷」在校《昆侖》和班《前哨》投稿，抒發愛國情懷。



▲ 黎保裕校友是位出色的藝評人

最令我難忘的，是我離家出走返廣州升大學的整個過程中，保裕兄和班內同學，一直給予我關懷和熱情鼓勵，幫助我解決不少困難，促使我順利成行。在我離港翌日，保裕兄還受我委托，親將我的留書送去我家。

1982年重組中華中學校友會，保裕兄即擔任校友會主席，直至2006年因病請辭止，歷時24年。他儘管工作繁忙，仍盡心盡力做好校友會工作，積極協助芬先生和師母處理好有關母校停辦後遺留下來的種種事宜；他對探討和研究華文中學在香港教育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直視為己任，可惜天妒英才，工作未及廣為展開就與世長辭。可幸的是，他早在2003年就以閒話家常的語調初步總結了近八十年來的中華中學校史，數十年間的校友工作，以及重新為母校的貢獻作出定位，用《報告絮語》的形式為文載於2003年6月出版的校友會會刊《國光》上。校史《年表》的〈結語〉，就是參照他這篇文章的內容寫成的。黃祖芬校長辭世前後，他為芬先生臥病期間和後事安排，奔波勞碌，毫無怨言，並花費很大精力組織出版了《黃祖芬先生紀念冊》。所以說：他不愧是「中華精神」的承傳者。

2006年6月，保裕兄建議我參加校友會工作，他對我說：「你老哥捱吓義氣啦，出山喇！」當時在電話裡聽到他那親切真摯的聲音，使我很感動，就一口答應了。我參加了校史《年表》的編寫工作，雖然花了不少精力和時間，但獲益更多，從中學習了母校的光輝歷史，對芬先生的為人和獻身於愛國教育事業的大公無私精神更加崇敬，並牢記以「中華精神」來鞭策自己。

保裕兄長期從事愛國教育工作，曾任育華中學教導主任，作育人才；另一方面，對中國傳統的民族音樂及地方戲曲素有研究和深入探討，是資深的藝評人，曾任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康文署音樂顧問，香港電台第四台的樂評節目主持人，在香港演藝學院擔任「劇場美術」教席，又在中文大學任教「文化研究」碩士課程，並以黎鍵筆名出版了《黎鍵的音樂地圖》。